

# 時 報

維新派宣傳機關之一

張 朋 園

(一)

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國民間已有私人所經營的報紙，而遲至同世紀之末，才有利用報紙為宣傳工具者，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梁啟超等蓋為最先發現報紙之富有宣傳力量者。甲午國恥，戊戌變法，知識分子能够有所認識，多受康、梁言論刺激而來。

戊戌變法之前，康、梁已展開言論宣傳活動，先後創辦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等日刊和雜誌<sup>①</sup>，政變之後，康、梁亡命海外，檢討失敗原因，咸認三年鼓吹，為時短暫，未能喚醒國人一致支持。惟有再接再厲，冀有捲土重來之日，決心以言論為依歸。十四年流亡期間，創辦報紙雜誌數十種，凡海外華僑聚居之地，無不有其言論機關。茲就較重要者開列於下：

名 稱	所 在 地	時 間	主 持 人	備 註
清議報	橫濱	1897~1901	梁 啓 超	旬刊
新民叢報	"	1902~07	"	"
新小說	"	1902~05	"	月刊
亞東報	大 阪			
天南新報	新嘉坡	1900~?	邱 蔽 園	日刊
China Times	"	1900~?	湯 攢、邱蔽園	"

① 中外紀聞，又名中外公報，一八九五年創於北京，為時共三月餘，詳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民五三年）頁二五四~二五六。

強學報，一八九五~九六，創於上海，鉛字排印，每日一小冊。

時務報，一八九六~九八，創於上海，詳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頁二五七~二七三。

知新報，一八九七~九八，創於澳門，旬刊。

東華新報	雪 犇	1900~?	唐 才 賴	"
文興報	舊金山	1899~1909	梁朝傑、歐榘甲 梁君可	日刊，後易名世界日報
大同(日)報	"	1900~1901	歐 楠 甲	後為革命黨所得
新中國日報	檀香山	1899~?	陳繼儀、梁文卿	
中國維新報	紐 約	1900~1909		
南洋總滙報	新加坡	1905~?	徐 勤、伍 莊 歐榘甲	原名圖南日報，得自革命黨
光華報	仰 光	1905~?		得自革命黨
啓南日報	曼 谷	1907~?	徐 勤	原名湄南日報，得自革命黨
華新日報	"			
民義報	馬尼拉	1904~09之間		
日新報	溫哥華	"	何卓競、黃孔昭	
烏島日報	爪哇	"		
墨西哥朝報	墨西哥	"		英文
金港日報	舊金山	"		
紐約日報	紐 約	"		中英文②

上述二十餘種報紙雜誌，從時間上看，自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九之間，年有增加；從地域上看，大多分散海外地區，受影響者，限於華僑而已。此種邊緣上的活動，於清廷及大陸四億人民，實不發生作用。因此在一九〇四年的保皇大會中，康、梁決定在內地創設言論機關，將維新主張輸入，全面影響。

康梁觀念之轉變，與他們的海外經營頗有關係。自一八九八年出亡之日起，諸事仰給於華僑。康有為深知維新運動非有財源不足以推展，然可以取得華僑之支持於一時，不可以永久無限制倚賴。因此將所得轉投資於生產事業，生財有道，取之不盡。康氏有商業頭腦，海外事業計有香港之華益公司及中華酒店，墨西哥之墨華銀行，及墨西哥電車事業公司，紐約之琼彩樓餐廳等。尤其是康有為親身主持之墨

②. 以上各報，參見 Jung-pang Lo,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1967) p. 181, 196, 259, 270；梁啓超與清季革命，頁二七三～三一一。

西哥事業，一度獲得厚利。如此一來，康氏有了餘力從事更大的發展。<sup>③</sup>原先康氏以「取之於華僑，用之於華僑」為原則，活動以教育華僑為宗旨，日後漸有向內地發展的趨勢。

向內地發展，關鍵在於康梁的眼光有了轉變。一八九五年康有為聯合公車上書，只看到了士大夫階級，創辦中外紀聞，則以喚醒士大夫為目的：

「以士大夫不通外國政事風俗，而京師無人敢創報以開知識。變法本原，非自京師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創中外紀聞〕每日刊送千份於朝士大夫，……令卓如〔梁啟超〕、孺博〔麥孟華〕日屬文，分學校軍政各類，日騰於朝，多送朝士，不收報費，朝士乃日聞所未聞，識議一變焉。」<sup>④</sup>

中國的傳統社會，士大夫最具影響力，康有為以士紳為爭取對象是一定的。但是到了海外，眼光逐漸改變，此可以梁啟超為例。梁氏主持中外紀聞時期，所見與其師略同，但一九〇二的「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便說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嚮導者，」不僅是重視影響政府，同時也要影響人民，看法已經改變。輿論的力量，拿破侖比之於四千枝毛瑟鎗。梁啟超則謂「報館者，摧陷專制之戈矛，防衛國民之甲冑也。」梁氏強調報館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雇傭，而報館則代表國民公意以為公言者。因此，報館之視政府，「如父兄之視子弟」，要加以指導，並不惜抨擊。梁氏論報館之嚮導國民，謂人民性情趨向保守，若不加引導，則不知前進方向。如何引導？一個「駭」字最為有效。如清末之言西學，言變法、言民權、言革命，「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民於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但是他又說，報館「其對國民，當如孝子之事兩親，不忘幾諫，委曲焉，遷就焉，而務所以喻親於道，此孝子之事也。」<sup>⑤</sup>無論如何，梁氏已認識言論的對象不僅是士大夫階級，要緊的還是人民。這是他們要向大陸發展言論的原因之一。

<sup>③</sup> 伍莊，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香港，一九五二）頁七七~九一；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臺北，民國六十年）頁二四一，三二八~三三五。

<sup>④</sup> 康有為，自訂年譜，（臺北，民六十一年）頁三十三。

<sup>⑤</sup> 梁啟超，「敬告我同業諸君」，飲冰室文集（臺北，民四十九年）之十一，頁三十六~四十。

其次，清廷因庚子一役之反動，招來八國聯軍的奇恥大辱，頑固態度稍事收斂，不再反對改革。慈禧太后嘗言，改革無何不可，「只要辦妥，深宮初無成見。」立憲運動雖然遲至一九〇五年才發動，而早在一九〇二～〇三年間已經萌芽。由於此一政治氣氛的轉變，清廷對康、梁的防範也就不似前此之嚴厲，維新黨也就有了發展的機會。

最重要的是，一九〇三年以後的維新會趨向於團結。梁啟超於這一年言論突然轉趨溫和，歐榦甲、韓文擧等人亦由疏離而向心。在此之前，梁、歐、韓諸人因受戊戌變法失敗的刺激，無日不言革命、破壞，如是者數年。但種種原因迫使他們不得不放棄激烈的革命，接受緩進的立憲。<sup>⑥</sup>康梁集團破鏡重圓，康有為的領導地位鞏固了，立即於一九〇四年年初在香港召開保皇大會。此次集會不僅表示該黨的重行緊密結合，會中且達成了若干積極的決議；向大陸發展宣傳，要為重大決策之一。

一九〇四年的保皇大會，康、梁討論伸展其影響力於內地，決定在香港設商報、在廣州設羊城日報、在上海設時報、在天津設日日新聞、在漢口設大江報。結果廣州、天津、漢口等地的計劃均不甚成功，而香港的商報和上海的時報却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香港為英國殖民地，清廷無法左右，又是一自由港，沿珠江進入內地，極其方便，這是商報成功的因素。時報的所在地上海，情況與香港相似，清廷不能干涉租界，而長江流域腹地廣大，所發生的影響則更為遼闊。本文以討論時報為主，該報不僅享受上海的特殊地位，且其主持人思想新穎，經營有方，有得力助手。該報跨越清民兩代（一九〇四～一九四〇），所發生的影響，遠超過康梁的期望。

## （二）

一般人均以時報為狄葆賢的事業。此一問題只有從時報的資金來源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張靜廬說時報「係利用唐才常〔庚子之役〕失敗後之糧臺餘款作基金，」<sup>⑦</sup>而包天笑則說：「當時籌集資本時，大概康、梁方面佔十之三，狄氏佔十

⑥ 詳梁啟超與清季革命，頁一六三～一七七。

⑦ 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上海，一九五三年）頁八七。

之七。」<sup>⑨</sup> 證諸康、梁方面的直接史料，他們宣稱爲時報消耗約二十萬之數。康有爲曾有函致梁啟超，言之甚詳：

「時報除癸年〔一九〇三〕經撥七萬外，甲年〔一九〇四〕撥款約二萬（原注：又借廣智〔書局〕二萬兩），丙〔一九〇五〕乙〔一九〇六〕年皆過萬，丁未〔一九〇七〕一萬，（原注：墨〔西哥〕銀行代出五六萬，苦極）計合十五萬，另外代交三年息三萬餘，合共總在廿萬左右。」<sup>⑩</sup>

梁啟超亦云其將廣智書局<sup>⑪</sup>資金一萬元加股時報。<sup>⑫</sup>

康、梁的函中有「加股」、「交息」等字樣，可以了解時報的組織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我們不能確定康有爲一九〇三年撥給狄葆賢的七萬元是否即張靜廬所說的「糧臺餘款」。如果是的，這筆錢就很難肯定屬於康或屬於狄。狄氏在自立軍起義時擔任糧臺工作，爲使自立軍前方不虞匱乏，曾將自己的許多心愛古董字畫變賣充作軍費<sup>⑬</sup>，不幸唐才常旋即失敗，這位後勤總司令所預備的支援並未全部送出。那麼，尚未消耗的糧臺餘款，可能就是康有爲所說的七萬元。若然，這七萬元屬於誰，就很難辨別了。但這七萬元也可能是華僑的投資，因爲康有爲言及代撥利息一事。所以這個兩可的問題，無法知其究竟。惟狄葆賢家道殷富，康有爲亦有財源，雙方都有投資，決無疑問，就不知道包天笑所說的七與三之比正確性如何而已。從報館的權責分配來看，包氏的看法似有相當真實性，因爲狄是報館主人（社長），康、梁方面只派了總主筆（總編輯）。

姑不論時報館的所有權誰屬，其爲維新派的喉舌則爲不爭之論，因爲康、梁、狄本是一家。狄葆賢（一八七三～？<sup>⑭</sup>），字楚青，號平子，或稱平等閣主，江蘇溧陽人。在傳統科名中爲舉人出身，少時曾遊日本，戊戌變法以前在北京生活，與名流相接納，康有爲公車上書，名列其間。康名重一時，慕名而拜之爲師者甚多，

⑧ 包天笑「辛亥革命前後的上海新聞界」，辛亥革命回憶錄，（四），（北京，一九六三年）頁八七。

⑨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民國四十七年）頁二六八。（以下簡稱丁編，梁譜）。

⑩ 廣智書局爲維新派文化事業之一，見張朋園，「廣智書局——維新派文化事業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臺北，民六十年）。

⑪ 丁編，梁譜，頁二九九。

⑫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民五三年）頁一八七。

⑬ 據陳定山，春申舊聞，（臺北，民四四年）頁五四～五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尚健在。

狄氏亦列名門牆。又與梁啟超投契，爲莫逆之交。戊戌變法失敗，狄氏思想轉趨激進，爲自立軍奔走，不惜變賣家產支持。事敗之後，亡走日本，灰心武力革命，態度轉趨溫和。此一轉變，與梁啟超如出一轍。狄氏認爲民智幼稚，欲望改革有成，必先開啓民智，曾有「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之名句。決心入言論界。

創辦時報，一九〇三年狄葆賢歸國之前，大致與康有爲、梁啟超已有成議。保皇大會在香港閉幕之後，康氏遣其弟子羅普隨同狄氏赴上海着手籌備，梁啟超旋亦加入共商細節問題，至是一切就緒。一九〇四年四月廿九日（陽曆六月十二日）正式出刊問世。時報係梁啟超所命名，其發刊詞及體例亦爲梁氏所擬定。<sup>⑭</sup>

時報的發刊詞引禮記、達爾文、斯賓塞等中外名家之言，頗有救時之志趣，茲引錄如下：

「時報何爲而作也？記曰：君子而時中，又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道國齊民，莫貴於時。此豈爲中國之教爲然耳；其在泰西，達爾文氏始發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理，而斯賓塞以適者生存一語易之。不適焉者，或雖優而反爲劣；適焉者，或雖劣而反爲優，勝敗之林在於是矣。是故狐貉誠暖，不足以當暑；湘葛云麗，不足以禦冬。與時不相應，未有不敝焉者也。今之中國，其高居於權要伏處山谷者，既不知天下大勢，謂欲抱持數千年之舊治舊學，可以應今日之變，則亦旣情見勢紬，蹙然如不可終日矣。於是江湖恢奇少年躊躇之士，其泰西各國之由何途而撥亂，操何業而致強也，相與歎之，奔走焉，號呼焉，曰吾其若是！夫彼之所以撥亂而致強者，誰曰不然，而獨不知與吾輩之時代果有適焉者否也。孔子曰，過猶不及。不及於時者蹉跎荏苒，日卽腐敗，而國遂不可救；過於時者，叫囂狂擲，終無一成，或緣是以生他種難局，而國亦遂不可救。要之亡國之咎，兩者均之。若夫明達沈毅之士，有志於執兩用中，爲國民謀秩序之進步者，蓋亦有焉矣。顧亦於常識不足，於學理不明，於時勢不審，故言之不能有故，持之不能成理。欲實行焉，而悵悵不知所適。縱奮發

⑭ 羅普記述時報的籌備及發刊：「甲辰春〔一九〇四〕，任公自澳洲返，〔誤，應自香港返〕，梁啟超遊澳洲在一九〇一年至滙時，尚在名捕中，未便露頭角，乃改名姓，匿居虹口日本旅館『虎之家』三樓上，時羅孝高〔普〕、狄楚青方奉南海〔康有爲〕先生命，在上海籌辦時報館，任公實亦暗中主持，乃日夕集商，其命名曰時報及發刊詞與體例，皆任公所擬定。」（丁編，梁譜，頁一九四）。

以興舉一二事，又以誤其方略而致失敗者，項相望也。則相與懲焉，不復敢齒及變革。嗚呼！全國中言論家、政治家，種類雖繁，究其指歸，不出於此三途。耗矣哀哉！今日千鈞一髮之時哉！同人有怵於此，爰創此報，命之曰『時』。於祖國國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適於當世之務者，束閣之。於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應於中國之程度者，緩置之。而於本國及世界所起之大問題，凡關於政治學術者，必竭同人譏諷之所及，以公平之論，研究其是非利害，與夫所以匡救之應付之方策，以獻替于我有司而商榷於我國民。若夫新聞事業之報導，世界輿論之趨向，內地國情之調查，政藝學理之發明，言論思想之介紹，茶餘酒後之資料，凡全球文明國報館所應盡之義務，不敢不勉，此則同人以言報國之微志也。雖然，西哲亦有言，完備之事物必產於完備之時代。今以我國文明發達，如彼其幼稚也，而本報乃欲竊比於各國大報館之林，知其無當矣。跬步積以致千里，百川學以放四海，務先後追隨於國家之進步，而與相應焉，斯乃本報所日孜孜也。吾國家能在地球諸國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報在地球諸報館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則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國民之恩我無量也夫！」<sup>⑯</sup>

時報刊行之前，有周密的計劃，其「發刊例」中強調重視論說（即社論）、紀事、分欄、編排諸方面。論說「以公為主」、「以要為主」、「以周為主」、「以適為主」；沒有黨見，只討論問題，且以與國民有關係而適合於國民之需要者為原則。紀事以「博、速、確、直、正」五字為原則。各地有訪事（即記者），以電報迅速報導之。報導尚確實，忠實，而不攻擊陰私。分欄有批評門、小說門、輿論門、外論門、新書介紹門、詞林門、插畫門、商務門、軼事門、瀛語門等。版面力求新穎悅目，打破傳統。<sup>⑯</sup>

時報之間世，果然使中國的新聞事業邁向了一個新的里程。一九〇四年以前的上海，原有申報、新聞報等幾家老資格的報紙，但是申、新兩報都已暮氣沉沉，其社論「仍舊做那長篇的古文論說」，其版面「仍舊保持那遺傳下來的老格式與老辦

<sup>⑯</sup>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二〇三～二〇四，（飲冰室文集未見）。

<sup>⑰</sup> 同上。

法」——用有光紙一面印刷。只有中外日報稍新，但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時報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它的兩面印刷、清晰分欄的版面，短小精悍的論說，富於「熏、浸、刺、提」的小說，立即獲得了讀者的喜愛。胡適對時報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說時報的內容與辦法，打破了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能够開闢許多新法門，能够引起許多新興趣，因此時報出世不久，「就成了中國知識階級的一個寵兒」，幾年之後，時報與學校幾乎成了不可分離的伴侶了。」胡適深受時報的影響，他於一九〇四年的二月間自家鄉到上海就學，兩個月之後時報就出版了。從第一張報紙開始，他就是忠實的讀者，如是者六年，無日不與時報為伍，他寫下了個人的感受：

「我那年〔一九〇四〕只有十四歲，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頗有一點文學的興趣，因此我當時對於時報的感情比對於別報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幾乎沒有一天不看時報的……我當時把時報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分黏成小冊子，若有一天的報遺失了，我心裏便不快樂，總想設法把它補起來。」<sup>⑯</sup>

兩年之後加入時報工作的包天笑也說時報是「空谷足音」。時報出版時，包氏在山東青州教書，雖然所讀的是三四天前的報紙，而青州沒有出版物，時報也就成了他的唯一精神糧食。<sup>⑰</sup>

### (三)

時報之所以能發生深刻的影響力，上文曾經指出這是由於它的風格新穎，有幾種傳統報紙中所看不到的創意。翻開時報來，該報每天三大張，共分六板。第一板報頭「時報」二字用一號大字，極醒目，下有 Eastern Times 英文，再下為「今天三大張售價二分」字樣，再下為編號，日曆及去年今日大事。本板全板為廣告，但以新書出版、學校招生類居多，（商務印書館的廣告不登別家報紙）其他商業性之廣告甚少。以首頁刊廣告，為一大膽之嘗試，蓋申、新等老資格報紙皆不如此。

⑯ 胡適，「十七年的回顧」，胡適文存（上海，民國十三年）卷三，頁一～八。

⑰ 包天笑，鉤影樓回憶錄，（香港，一九七一年）頁三一二～三一三。

第二板第一欄頂端為「社論」，社論之下為要件，要件之下為「小說」。次頁頂端為諭旨，以次為「專電」、「要聞」，左下角為「時評一」。再次頁為廣告，醫藥、娛樂類居多。第三板為「地方要聞」，左下角為「時評二」，次頁為廣告。第四板為「本埠新聞」、「小說」，左下角為「時評三」，次頁為廣告。第五板為「來稿」，未完之要件、奏摺、插畫等。第六板為「商務」消息、廣告。此是為時報的外貌。凡新聞皆以四號五號字間雜合排，重要語句用四號字，否則五號字，頗為醒目，此亦時報所獨有。

時報的板面如此，以今日眼光觀之，並無特殊之處。然自新聞發展史的觀點言之，則多種風格均為時報所創。第一為「專電」。清末報紙雖已漸次興起，但並無通訊社之設立。政府除了發布上諭，一切活動諱莫如深。報館要知道消息，非派記者不可（當時稱特派員）。特派員的制度，在中國始於字林西報（North China Herald）。西洋人在北京有使館，可以與使館聯絡，取得重要消息。中國報館沒有特派員，只有轉譯西文報紙的消息，是一種恥辱。時報有感於此，決定派遣自己的特派員駐京，拍發專電。（時報為了打聽政府的消息，曾經設法買動政府官員，例如王文韶的孫婿鍾某，便因任時報館的通訊員而以洩漏政府機密罪入獄。）<sup>⑯</sup>

時報的第二種新風格為特約通訊。專電是簡短的消息報導，而對於政局或時勢的分析，則有賴於較為詳細的報導，時報因此聘請專人撰寫特約通訊。此類有系統而帶有文藝性的時局觀察或人物評論，筆調輕鬆，富於幽默感，每篇一千二百字，不長不短，讀來過癮，恰到好處。時報的特約通訊通常刊於專電之後，對世局有興趣者，讀完新聞之後再讀特約稿，可得進一步之了解。

第三種新風格為副刊。時報從開始就在新聞之後登載小說、雜文、詩詞之類文字，如狄葆賢的「平等閣筆記」、「平等閣詩話」。包天笑進館之後，則創「餘興」，凡不屬於新聞、論說的雜著，則載於此一專欄中，這就是副刊，惟當時無副刊之名而已。據包天笑說，自闢此欄之後，投稿者非常踴躍，五花八門，矜奇鬪巧，諷刺歌曲，遊戲文章，可謂層出不窮。<sup>⑰</sup>

<sup>⑯</sup> 同上，頁三四七。

<sup>⑰</sup> 為「餘興」寫稿，不奉酬報，但狄葆賢另有「有正書局」，即以該局書券贈送，執券者可得贈書。（鄭逸梅，上海舊話，〔上海，一九五七年〕，頁五七）。

在所有副刊中，時報的小說最為引人入勝。時報出版時，正是小說流行的當頭，「往往一種情節曲折，文筆優美的小說，可以抓住許多讀者，」這是時報銷路迅速增加的原因之一。胡適說：時報引起一般少年人文學興趣的就是它的小說。早先，徐家滙的滙報也有小說，但那種小說不過是聊齋式的怪異小說，沒有什麼影響。其他的報紙則「乾燥枯寂」，只有一兩篇合於古文義法的長篇論說。而時報的小說，無論是白話小說或譯譯小說，文筆都很好，如雙淚碑、銷金窟，舉例言之，都是風行一時而發人深思，富於意義的小說。福爾摩斯探案也是時報最先刊出的。<sup>②</sup>

時報的第四種新風格為「要聞」、「本埠新聞」、「外埠新聞」之分版。原先資格老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其版面極為刻板。以申報為例，該報第一頁為社論，社論之後消息隨之，均用五號字，一條跟一條，毫無變化。第四頁以後之廣告，也是五號字。時報一改這種死板的格式，用四號五號字間參排版，已有醒目之感，<sup>③</sup>再將新聞歸類；北京來的新聞納入「要聞」欄中，他處消息入「外埠新聞」欄中；由於上海是一個一日千里快速成長的國際都市，新聞繁多，用「本埠新聞」容納之，一目了然。

隨著新聞的分欄，時報認為各欄皆可發表評論，所以創「時評」，是為時報的第五種新創意。「時評」含有「時事評論及時報評論的意思」。<sup>④</sup>字數不多，少則數十字，或百餘字，通常不超過三百字。這種短小精悍的短評，比之長篇累牘的論說，易於使人動目。事情忙的人不讀長篇大論。對於政治沒有興趣的人根本不讀論說。而且老資格的報紙，其論說都沒有標點，人皆畏讀，人稱之為「報館八股」。而時報的「時評」則避免了此種毛病。該報有「時評一」、「時評二」、「時評三」以配合「要聞」、「外埠新聞」、「本埠新聞」三版，短小精悍，一齊讀下去，可得深刻印像。胡適對於「時評」有如下的批評，指出了它的影響力：

「時報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做的人也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故能引起

② 同①；時報有了「餘興」副刊，申報亦刊「自由談」，新聞報刊「快活林」（包天笑，鉤影樓回憶錄，頁三五〇）。

③ 可能受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風格影響，該報即為四號五號字間雜排版。曹聚仁說：時報吸收了新民叢報的氣氛。（見曹著，文壇五十年，頁六六）。

④ 包天笑，鉤影樓回憶錄，頁四一九。

許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讀者腦筋裏發生有力的影響。我記得時報產生的第一年裏，有幾件大案子，一件是周有生案，一件是大閩會審公堂案。時報對於這幾件事，都有很明快的主張。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評，有時還有幾個人簽名的短評，同時登出。這種短評，在現在已成了日報的常套了，在當時却是一種文體的革新。用簡短的詞句，用冷雋明利的口吻，幾乎逐句分段，使讀者一目了然，不消費功夫去點句分段，不消費功夫去尋思考索。當日看報人的程度，還在幼稚時代，這種明快冷刻的短評，正合當時的需要。我還記得當周有生案快結束的時候，我受了時報短評的影響，痛恨上海道袁樹勳的喪失國權，曾和兩個同學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也可見時報當日對一般少年人的影響之大。這確是時報的一大貢獻。我們試着這種短評，……逐漸變成了中國報界的公用文體，這就可見他們的用處與他們的魔力了。」<sup>②</sup>

時報除了上述種種獨創意之外，其圖畫欄所刊之諷刺畫，「小時報」（報屁股）之里弄瑣聞，亦極具特色。不久又增加教育、實業、婦女、兒童、英文、文藝等周刊，都是後來新聞界共同的典型。民國建元之前，時報總是站在時代的前驅，領導中國的文化，「拖着望平街的老爺車向前進步。」<sup>③</sup>

#### (四)

時報的種種創意，誠如胡適所說，以時評的貢獻最大。下面選錄若干實例，以見一斑。

首先介紹時報對於立憲運動的態度。康有為、梁啟超為立憲運動的領袖，時報當然是支持此一運動的。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立憲派人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先後三次請願，清廷迫於大勢，不得不於第三次請願之後，縮短九年預備立憲期限為六年。<sup>④</sup>然政府於宣布縮短三年上諭之同時，又勒令請願人士立即出京。時報對此兩者有「時評」評論：

② 同①。

③ 曹聚仁「文壇五十年」頁三。按望平街為上海的報館街，申報、新聞報、中外日報等都集中在附近。

④ 詳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上編。

「以如火如荼之請開國會，而以如水如冰之手段應之；見其不可，則又以半迎半拒之手段遷延之。政府之畏聞國會也，如畏劇盜；請開國會之逼問政府也，如勒劇盜口供。政府諸公何苦乃爾！」<sup>②7</sup>

形容請願國會為勒逼口供，筆法戲謔而刺激深刻。另一則時評寫驅逐請願代表事：「國會何為而縮短三年，以國會請願代表之請也；代表何為而驅逐出京，以請願速開國會也。然則請願國會而以為非歟，何以有速開三年之上諭？速開國會而以為是歟，何以有驅逐代表之出京？代表卽有罪，我意決不應受驅逐出京之報酬也。或曰：是蓋欲示國會速開之舉，出自政府，不與汝輩代表事耳。嗚呼！使此宣統五年召開國會之諭旨，而出于代表未入京以前，誰不云然。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sup>②8</sup>

筆法亦極盡諷刺。立憲派要求組織責任內閣，清廷則組織親貴內閣，資政院民選議員抨擊之。清廷不滿，欲修改資政院章程，削其權力。時報評之，措詞亦多諷刺：「親貴內閣，則曰載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然則資政院章程獨非先朝所欽定者耶？奈何汲汲議改也？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何以服天下人心！」<sup>②9</sup>

立憲運動的同時，有革命運動，武昌起義之前的四川爭路風潮是為辛亥革命的前奏。這次風潮，立憲派和革命黨同時捲入，時報因此密切注意，有詳細報導。亂事初起，時報不斷有時評，其「官民開戰之初機」謂百姓之反抗政府有理由可持：「革命黨者，抱一主義與政府反對者也，非普通之人民也。若四川省此次之反抗，則一般之人民也。各地之匪亂，或搶米等等，無意識之舉動也，非有理由可持也。若四川省此次之反抗，則持有理由者也。故此次四川省與官吏之交戰，實為官民開戰之始。」<sup>③0</sup>

又「川路槍聲記」指責清廷以武力鎮壓，四川人民行將過暗無天日的日子：

「四川省之官民開戰矣！四川省之保路商權書，川民之宣戰書也。今日之諭，政府之宣戰書也。川人既宣戰，於是數千人圍逼督署，其結果至死數十人而退。

②7 時報，庚戌（一九一〇）、十、二。

②8 時報，庚戌，十、四。

②9 時報，辛亥（一九一一年）、六、十四。

③0 時報，辛亥，七、廿一。

政府既宣戰，於是調新舊軍，於是調鄰省兵，於是擁兵入川之大臣。嗚呼！川省之民，行見暗無天日矣！」<sup>①</sup>

又「說川亂」呼籲全國人民不可坐視清廷之暴力鎮壓：

「川省風潮，日緊一日，箇督署、捕議長、官民交綏，愈接愈厲。川省大局固糜爛矣！然我不知各省之人民，其對於川省之態度如何？川省亦中國地方之一也，詎長此忍置不問耶？！」<sup>②</sup>

另一則「川路槍聲記」寫清廷先後派遣趙爾豐、端方、岑春煊等人入川平亂之手忙腳亂：

「嗚呼！斯可謂政府之奇策矣！以川路風潮，王人文不能奉承意旨之故，因促趙爾豐到川；趙爾豐不能鎮壓之故，復命令岑春煊往川。趙爾豐之到川也，爲四川總督也，端方爲鐵路大臣也，而岑春煊則既非川督，又非鐵路大臣，既不予以官銜，復又授以職事，徒以手無寸柄之人，使之理紛亂如麻之事。事之濟否，且置勿論，其設想亦可謂奇特者矣！」<sup>③</sup>

另一則「說川亂」暗示大難之即將臨頭：

「川事變已大定，拘議長確也，斃平民確也。而官吏則云均無恙。然則端方可以從容入蜀，而岑春煊亦可以宣撫到川，一天風雲，頃刻散盡，政府可以高枕無憂矣乎？」<sup>④</sup>

武昌起義，上海報紙一折而入於革命之言論，時報亦不例外，此在下節中尙有詳論。富於諷刺的時報時評仍不斷推出，如其論清廷之既不能戰，又不能和，而又不退位，指之謂「清皇族爲絕物」（時評標題）：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清皇族之對於民軍，既不能戰，又不能和，而又不肯退位，是真所謂絕物矣！既不能不用袁世凱以自衛，而又不敢舉所有以委之，而欲幸免，其可得耶！」<sup>⑤</sup>

① 時報，辛亥，七、廿二。

② 時報，辛亥，七、廿四。

③ 時報，辛亥，七、廿五。

④ 時報，辛亥，七、廿八。

⑤ 時報，辛亥，十二、三。

當退位在即之時，清廷擬用國民大會公決為延宕，時報刊「退位與公決」，謂共和大定，不必有國民公決之贅舉，儼然立於敵對的立場：

「退位與公決，二者不必並行者也。因為清帝不退位，民軍欲共和，二者不相容，乃有國民公決之調停策。今清帝即退位，是共和已大定，君主之說已經消滅，何必再有國民公決之贅舉哉！故余謂國民公決之說，立即可以取消。」<sup>⑯</sup>  
以上所舉各例，可以概見「時評」的特色。

### (五)

時報能够有許多新聞史上的創意，尤其是「時評」欄之受人歡迎，發生深遠影響，蓋與該報的一批得力工作人員有密切的關係，請將該報人事略作說明。

時報之成立，只有一個目標——為維新運動而努力。康有為、梁啟超和狄葆賢之間並無明顯權責之分。狄氏是報館主人，當然有人事決定權，雖然，康梁所推薦的人，狄氏也一並接受了。開館之初，重要工作人員有羅普、陳冷、雷奮、馮挺之等人，兩年之後加入包天笑。茲分別介紹各人背景及性格如下：

羅普，字孝高，廣東順德人，康有為得力弟子之一，曾協助梁啟超主持新民叢報，撰寫論說性文字甚多，凡署「孝高」、「羽衣女士」、「披髮生」者均屬之。民國年間，羅氏曾任廣東實業司長。時報成立時，羅氏參與籌備事宜，康有為薦為總主筆，主持社論。

陳冷（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景韓，筆名冷血，亦署冷、景寒、華生、無名、新中國之廢物等，江蘇松江人，日本熊本中學畢業。陳氏以寫小說起家，文筆「簡潔雋冷，令人意遠。」若干譯文，譯筆流暢，為讀者所歡迎。陳氏蓋因同鄉關係而與狄葆賢認識。開館即擔任新聞編輯，「要聞」及「外埠新聞」兩欄歸其主持。陳氏不僅文筆好，且有辦事才能，遇事「果斷明快」，「舉重若輕」，乃時報之臺柱。其人脾氣古怪，不喜交際，凡遇婚喪喜慶，一概不予應酬。每日騎腳踏車上下班，口啞煙斗，辦事認真。其妻去世之後，精神完全寄託於工作，每天必定深夜看過大樣之後始回寓休息，往往通宵工作，而不以為苦。狄葆賢倚為左右臂。<sup>⑰</sup>

<sup>⑯</sup> 時報，辛亥，十二、一。

<sup>⑰</sup> 朱傳譽，報人、報史、報學，（臺北，民五六六年）頁二〇～二七；包天笑，鉤影樓回憶錄，頁三二三。

雷奮（一八七六～一九一八），字繼興，亦署子勤。江蘇松江人。生員出身，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又拜張謇為師。「思想敏捷，絕頂聰明」。文章通暢透切，口才尤其突出。上海兩位大演說家，一為馬良，一為雷奮。但人謂馬良矜才使氣，雷奮則舉止從容，穩健有力。一九〇九年當選諮詢局議員，一九一〇年入資政院，以雄辯著稱，人譽為資政院民選議員中三傑之一。雷氏與張謇、趙鳳昌等江浙集團領袖關係密切。民國初年曾任江西高等檢查廳檢查長，以肺結核而早逝。雷氏與陳冷為郎舅關係（陳妻為雷之胞姊），與狄葆賢至交。在時報館任「本埠新聞」編輯工作，亦為要角之一。<sup>⑧</sup>

包天笑（一八七六～一九七三），原名公毅，筆名朗生、天笑生、笑、釧影、餘翁等，江蘇吳縣人。因以小說投刊時報而與陳冷、狄葆賢認識，一九〇六年入時報館工作，擔任「外埠新聞」編輯，同時撰寫小說。其小說多含教育或諷世意義。五四運動以前，聲名一直不衰。包氏在時報館工作十四年（一九〇六～一九一九），民國元年陳冷離去之後，成為臺柱。<sup>⑨</sup>

馮挺之，廣東人，背景不詳，康有為所推薦，與羅普同任筆政。

以上是為時報的主要工作人員。<sup>⑩</sup>很顯然的，時報分成了江蘇人和廣東人兩個小集團。江蘇人以狄葆賢為中心，廣東人則擁護康、梁。中國人最講究人際關係，時報有所分，並不為奇。但是時報的兩個小集團却產生了一個意料以外的結果。原來狄葆賢主持下的報務，最初有很密切的合作。狄氏注重社論，每天必與羅普、陳冷、雷奮等人聚談，此不僅增加親切感，同時可以討論如何改進社論。狄氏嘗要求不可閉門造車，一己杜撰。<sup>⑪</sup>但是廣東人和江蘇人都喜歡說自己家鄉的方言，而江蘇人聽不懂廣東的方言，廣東人亦聽不懂江蘇話，無形中形成了一層隔膜。而羅普是總主筆，陳冷、雷奮、包天笑等所撰的社論，都要經羅氏過目。羅本着他的老師康有為的指示，發言有一定的方向。陳、雷、包等則不受此種約束，每每放言高論，嚴厲批評政府，偶然還暗示革命之不可避免。羅普於此類社論當然不予登出，或

<sup>⑧</sup> 同前，頁四一；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八五。

<sup>⑨</sup> 包氏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去世，享年九十七歲。近年先後刊行「釧影樓回憶錄」及「釧影樓續憶」二書。

<sup>⑩</sup> 在時報工作的人員尚有馮傑、林祖潛、戈公振等人，為時均短暫。

<sup>⑪</sup>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頁三一八。

登出，事先已有所修改。咬筆桿的人對自己的文字被人改竄最不愉快；被改的次數多了，起了厭惡之心，自然而然的就不寫了。本來大家分擔論說，如此一來，陳、雷、包三人的文字漸漸減少，由減少而絕跡。羅普無可如何，只有獨任其事，有所幫助，馮挺之和另外一位廣東人而已。久而久之，時報的社論和新聞就分開了。社論和新聞分立，在今日已有若干報紙採為政策，如美國紐約時報即特別有此講求；該報寫社論的人不管新聞，為的是避免新聞報導不够客觀。六十餘年前的上海時報，因為人事關係，論說與新聞儼然獨立，真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竟為中國新聞事業創了一個先例，當然康、梁也貫澈了他們的方針。

但是時報的論說與新聞分立還是有限度的，因為時報發生較大影響力的，不是社論，而是時評，而「時評一」、「時評二」、「時評三」分別與「要聞」、「外埠新聞」、「本埠新聞」同版，撰寫人正是本版的主筆，其評論絕非絕對客觀，更難免個人的好惡。所幸這三版的主筆並不保守，都能抓住讀者的心靈發言，時評二三百字所贏得的好評，過之於二三千字的社論。

時報的工作人員，除了上述在館諸人外，還有幾位寫特約通訊的記者，亦當略為介紹，因為他們所寫的特稿，其影響力不在陳冷、包天笑等人之下。

黃遠庸（一八八四～一九一五），原名為基，又署遠生。江西德化人，進士出身，留學日本，曾在郵傳部任職，因對新聞事業有興趣，以記者為副業，竟為中國記者的先驅。黃氏在日本與雷奮同學，與狄葆賢、梁啟超等人均相熟，自時報開館即擔任駐北京通訊員。所撰特稿膾炙人口，他「能把雜亂無章的議論或說話，編成一段很有條理的文字，或則觸類旁通，引伸許多道理出來。他的理解力和他文字上的組織力，實在有過人之處。」「他的文字就像他的人，活潑的，天真爛漫，不加修飾，不加思索，有什麼說什麼的。」<sup>42</sup> 黃氏的遺文今收在遠生遺著中，其政論性特稿，「全用批評的態度，所根據的材料，比較的也很正確，絕不信口開河……敍述一事，恰如其分，調查研究，有種種修養……他要做一回通訊，拿起筆來，在他是一點不費腦力的事，他所費力的，就是一一收集材料，差不多要直接由他本人得來的消息，才去評論他。」「他評論一個人或一回事情，一種問題，都分析得很清

<sup>42</sup> 「林志鈞序」，遠生遺著，（臺北，五十一年影印）頁一～二。

楚，研究得很精細。」<sup>⑭</sup> 時報有這麼一位特約記者，吸引更多的讀者，自在意料之中。當時日本及歐美在北京的記者，皆謂中國惟有黃遠庸是真正的記者。<sup>⑮</sup>

邵飄萍，原名振青，又署萍、阿平。浙江金華人。因包天笑之介紹而擔任時報駐北京記者，負責專電之拍發及撰寫通訊。邵氏「個人研究歷史，因此他的通訊含有高度的正確性與啓示性。文辭簡潔，可見其語文的修養工夫。」<sup>⑯</sup> 包天笑謂邵氏的新聞，如張網一般，無所遺漏，他對時報、申報均發專電，幾有壟斷上海新聞的意味。<sup>⑰</sup>

徐彬彬(1889~1961)，原名徐彬，署凌霄、徐凌霄、凌霄、漢閣主、老漢等。江蘇人，為清末世家。亦因包天笑之介紹而擔任時報通訊員，包氏批評其「文章多肉而少骨，」且謂其不能得到重要消息。<sup>⑱</sup> 但曹聚仁則甚欣賞徐氏之報導，謂其「比黃遠庸還能吸引讀者。」<sup>⑲</sup> 徐氏視政壇如劇場，以戲劇筆法出之，更能使人了解世變的線索，也是一代奇才。

以上是時報三位知名的特約記者，他們每星期至少各有兩篇通訊。因為他們的筆法有系統，而帶有文藝性，對時局又有深入的觀察，評論人物筆調輕鬆而幽默，每篇一二千字，不長不短，極受歡迎，這也是時報影響力之所在。

除此之外，時報海外也有特約通訊。梁啟超和湯叡專門報導日本的消息，康有為的弟子徐勤、歐榘甲等報導美國、香港、東南亞等地的消息。乃至於紐約，倫敦等地也有特派員，因此該報的世界評論亦有相當份量，亦是該報聲譽鵠起的因素。（舊日報紙均不重視世界新聞，偶一為之，多半繙譯西文報紙的現成文字。）在這些海外記者當中，梁啟超的貢獻最大。當一九〇四~〇五年間的收回粵漢鐵路一案發生後，梁氏覓得全案電稿，交由時報發表，一一加以按語，以促國人之注意，對該路之收回自辦，梁氏「常帶感情」的文筆頗有影響。<sup>⑳</sup>

<sup>⑭</sup> 同上。

<sup>⑮</sup> 曹聚仁，文壇五十年，頁一九二。按民國四年黃氏遭暗殺，蓋南方誤以其為擁護袁世凱帝制者。

<sup>⑯</sup> 同上。

<sup>⑰</sup> 包天笑，鉤影樓回憶錄，頁三四九~四二六。按邵氏因攻擊北洋軍閥，於十五年為張作霖所戕害。

<sup>⑱</sup> 同上，頁三四八。

<sup>⑲</sup> 曹聚仁，文壇五十年，頁一九二。

<sup>⑳</sup> 丁編，梁譜，頁一九四。

(六)

姚公鶴在「上海報紙小史」中說：「至庚戌〔一九一〇〕辛亥〔一九一一〕間，即立憲派之報紙，悉已一折而入於革命運動，此則清廷存亡絕續之大關鍵，尤上海報紙黨見離合之一段落矣。」<sup>⑤0</sup> 姚氏的觀察有相當深度。時報、申報、中外日報等原都是立憲派的報紙，時報受康、梁的影響，申報、中外日報則受張謇的影響。這幾家大報鼓吹立憲，憤於清廷之拖延敷衍，久已不滿，時報是很好的例子。關於時報在立憲運動中的地位，前文已經提過，這裏再談其在辛亥武昌革命爆發後的轉變及其關鍵。

武昌起義後時報的態度，第一次之社論「論鄂亂」，稱亂而不稱革命，同時又希望清廷能及早「綏靖叛亂」，<sup>⑤1</sup> 顯示仍堅守一貫立場。次日之社論「哀哉製造革命之政府」，對清廷頗有貶責之意，但仍寄望清廷「知所悔悟」。<sup>⑤2</sup> 然該報同日之新聞報導有了轉變，其以「中國革命消息」為題之專電，稱武昌起事為革命，而不再到以亂事視之。又刊載革命軍所發布之文告，甚為出人意料，雖然其中「滿洲」、「滿」等用詞，視為不敬，均用□□代替。此顯示該報社論、新聞之各不相涉，新聞已率先有了轉變。此後各日的報紙，字裏行間，離心力漸增，約二十天後，則完全為革命論。茲選錄時評兩則，以見一斑。其一寫革命軍與清軍之仁暴有若天壤：

「革命軍得漢口時，土匪有放火搶刦者，革命軍率衆往撲滅之；官軍之得漢口也，首先放火，焚斃商民無算，其仁暴奚若！」<sup>⑤3</sup>

第二則寫革命軍與清廷之誓不兩立，以第一二人稱敵我：

「今日戰鬪已開，政府與國民決無並存之望，非我滅彼，即彼滅我。」<sup>⑤4</sup> 此後之革命文告照錄，不再刪節其用辭。新年刊「中華民國立國記」，正月四日用「中華民國」紀年。時去清廷遜位尚有一月又八日。

⑤0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民二十二年）頁一八七。

⑤1 時報，辛亥，八、廿三（陽曆十月十四日）。

⑤2 時報，辛亥，八、廿四日（十月十五日）。

⑤3 時報，辛亥，九、十一日（十一月一日）。

⑤4 時報，辛亥，九、十七（十一月七日）。

時報一折而入於革命論，蓋與該報的息樓——一個與外界名流接觸的場所——有關。關於息樓，包天笑提供了若干資料。包氏說這是一個俱樂部性質的場所。報館以文字工作為主，早年各報皆不注意會客室之設置，往往有朋友來訪，直入主筆室，不僅打斷正在進行中的工作，而且往往發生獨家新聞不胫而走的情事。為避免這種不利的情況，所以時報主人狄葆賢「就收拾了兩間房子，安排了一些娛樂品，另外雇用一個茶房，凡是走熟的幾位朋友，都請到那裏用茶，可以隨意看報，頗有些俱樂部的性質。」<sup>⑤</sup>包天笑認為息樓的功用有四：人人可以在此聚會；可以招待朋友；工作人員休息之處；避免往來客人直入主筆室。但他又說：「這個止〔息〕樓裏，只有幾個極熟的人方到這裏來。」<sup>⑥</sup>可見這地方並非常人可去。最近包氏在他的「鉤影樓回憶錄」中列出了息樓的常客，茲節述如下：<sup>⑦</sup>

沈恩孚，字信卿，江蘇吳縣人，舉人出身，上海龍門師範學校校長。「學高望重」，人稱「信先生」，辛亥革命時期為張謇集團中活躍分子之一，民國六年曾任湖南教育廳長。

袁希濤（？～1930），字觀瀾，江蘇寶山人，舉人出身，辛亥時期亦甚活躍，民國初年曾任教育次長。

黃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江蘇川沙人，舉人出身，與沈恩孚、袁希濤合稱「息樓三舉人」。名教育家，辛亥前為江蘇諮詢局議員，辛亥後一度任江蘇教育司司長。民國年間，國民政府多次擬任為教育部長，均堅辭不就，然終身獻身教育事業，尤對上海職業教育社貢獻卓著。

龔傑，字子英，江蘇吳縣人，生員出身，精於算學，為商業界鉅子，革命後一度任江蘇財政司長。<sup>⑧</sup>其兄子瑜為上海滙豐銀行華人經理。

林祖諳，字康侯，上海人，生員出身，且曾留學日本，為南洋公學附屬小學校長，以後轉入銀行實業界。

⑤ 包天笑，海上蜃樓，（上海，民十五年），頁一四一～一四二。按包氏所著「海上蜃樓」一書，似模仿曾孟樸之「孽海花」筆法，人物皆有所隱射，「息樓」在本書中隱為「止樓」。

⑥ 同上，頁一四八。

⑦ 以下人物如非特別注明，均取材自「鉤影樓回憶錄」三二八～三三三頁。

⑧ 張朋園，「民國職官年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下），頁四三。

史量才（一八七九～一九三四），原名家修，南京人，杭州蠶業學校畢業，自辦女子蠶業學校，爲息樓之常客。辛亥革命時任松江鹽運副使。其人極有才幹，民國元年，因張謇、趙鳳昌等之促成，接辦申報。

吳恒久，上海人，創辦務本女學，爲私人興辦女子學校之先驅者。

朱葆康，字少屏，上海人，辦健行公學、環球中國學生會，幫助留學生出洋，貢獻甚大。又爲「南社」主幹，同盟會會員。二次中日戰爭期間，以抵抗日本侵略而被戕害。

楊白民，上海人，城東女學校長，與時報館往還密切，其城東女學之教員，如陳冷、雷奮、林祖諳、黃炎培、包天笑等多爲時報館之工作人員。

楊廷棟（一八七七～？），字翼之，江蘇吳縣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組織憲政預備立憲公會，爲張謇之得力助手。一九〇九年選爲江蘇諮詢局議員，參加國會請願，十分活躍。

管趾卿，無錫人，西門子洋行經理，息樓中惟一非學界人。

葉養吾，江蘇青浦人，留學日本商科大學，家道殷富，興辦嘉興、紹興兩處之電燈廠，爲一實業家。其弟葉石亦留學日本，兄弟二人均時報之常客。

楊蔭孫，蘇州人，留學比利時，入銀行界，曾任北京交通銀行行長。

楊景森，蔭孫弟，留學美國，曾爲時報繙譯新聞學方面之文字，以肺結核早逝。

以上是包天笑所提到的息樓人物。余芷江則說還有趙鳳昌和李平書。<sup>⑤9</sup> 嚴謄聲又說「息樓以張謇爲首。」<sup>⑥0</sup> 這些說法大致都是可靠的。張謇、趙鳳昌、李平書、雷奮、楊廷棟等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近年來已有不少報導和研究，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sup>⑥1</sup> 息樓與他們的活動當然有密切的關係。嚴獨鶴說：

「狄楚青在時報館樓上闢有精室提曰『息樓』，作爲朋儕憩坐清談之所。當辛亥革命風雲勃起的時候，狄楚青和一些對政治有興趣或有關係的朋友，常在息樓上聚談，或對政治有所討論，于是息樓人物無形中也成爲一個自然集合而含

⑤9 余芷江，「辛亥上海光復前後」，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三。

⑥0 同上。

⑥1 沈雲龍，「張謇、程德全對辛亥開國前後之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六十年六月）；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十章。

有政治性的小團體。」<sup>②</sup>

息樓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意義已很明顯。

以張謇為首的立憲派人，他們的有形團體是江蘇教育總會（一九〇五年創立）、預備立憲公會（一九〇六年成立）、江蘇諮詢局（今之省議會，一九〇九年成立）。雖然在名義上看去是三個不同的組織，實際上是三位一體，張謇以下的人物在這三個機構中都有一席之地。張謇是教育總會的會長，是預備立憲公會的副會長，是江蘇諮詢局的議長。前述息樓人物多半與這三個組織直接間接有關。以狄葆賢為例，他是教育總會的幹事，在預備立憲公會中是會員，在諮詢局則為議員。人們譏諷教育會的人物為「西門破靴黨」，罵他們是學閥，把持教育界，可以想見他們的勢力。<sup>③</sup> 預備立憲公會刊行「憲政雜誌」，一九〇九年以後時報亦為其宣傳機關。江蘇諮詢局可以說是溫和型知識分子的擴大結合。張謇既然率先贊成革命，江蘇人士自然而然的隨着張氏轉變。時報言論的轉變，不過其中之一而已。

## （七）

時報在辛亥年一折而入於革命論，狄葆賢置康、梁於何地？當初康、梁計劃在上海設報館，宣傳固為最重要的目的，何嘗沒有藉此為內地聯絡站的意義。張謇所領導的江浙立憲團體，其勢力之雄厚，康、梁是非常明白的，不能沒有他們的支持，狄葆賢實負有聯絡的使命。但狄氏與張謇接觸之下，發現張氏無意與康、梁提携。按張謇雖為立憲運動主角之一，與康、梁目的無二，但張氏在傳統社會中的地位（狀元及第）極其崇高，祇有他人前來倚附，未有入於他人旗下之理。張謇獨樹一幟，由來已久，從組織預備立憲公會一事可以得見。預備立憲公會之組成（一九〇五）早於其他立憲團體。及至一九〇九年發動請願速開國會，張氏居於全國領導地位。狄葆賢受康、梁的付託，前來聯絡，不僅不能取得支持，而震於張的聲勢，連自己的立場亦隨之改變，漸漸與張接近。

狄葆賢與張謇的接近，無異於與康、梁的疏遠。當然，康梁流亡海外，實亦無

<sup>②</sup> 嚴獨鶴，「辛亥革命時期上海新聞界動態」，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八四。

<sup>③</sup> 包天笑，鉤影樓回憶錄，頁三五一～三五二。按江蘇教育總會會址在上海西門外。

法長久保持緊密關係。此種情形至一九〇七年而表面化。是年梁啓超組織政聞社，欲向內地發展，<sup>④</sup> 曾派徐佛蘇至上海聯絡，張謇對此態度冷淡，<sup>⑤</sup> 而時報也不予支持，所刊政聞社消息不多。狄氏惟恐政聞社給時報帶來麻煩，心理上的畏懼，顯然與個人態度的改變有關。梁啓超對此憤憤於形，曾致函康有爲，指責狄氏頗甚。當時康有爲以為狄氏見利忘義，而梁啓超則遷怒於陳冷。陳冷對狄固然有所影響，實則應是狄氏轉入張謇旗下的結果。茲將梁啓超函節錄如下，讀之可獲進一步的了解：

「有一事極難處置者，則時報問題是也。據君勉〔徐勤〕、覺頓〔湯叢，二人皆康有爲弟子〕之說，則直指楚卿爲叛黨之人，謂其居心叵測，君勉想早已有書寄先生處評之矣。然弟子及孺博〔麥孟華，亦康之弟子〕之意，則謂其尚不至是。但楚卿入世太深，趨避太熟，持盈保泰之心太多，恐本黨累及時報，此則誠有之。吾黨費十餘萬金以辦此報，今欲擴張黨勢於內地，而此報至不能爲我機關，則要來何用？無怪諸人之憤憤也。即相伯〔馬良，政聞社總務員〕、秉三〔熊希齡〕亦深不滿於楚卿，其餘在滬〔政聞社〕社員尤憤極，蓋緣楚卿信用陳景韓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實非吾黨。孝高亦祖此人，怪極。故於黨事種種不肯盡力，言論毫不一致，大損本黨名譽，弟子所深恨者在此。若君勉等許其數目糊塗，謂楚卿牟利，則弟子尚信其不至是。」<sup>⑥</sup>

包天笑說：「康、梁對於時報，從未對於事務上及編輯上有所干涉，」<sup>⑦</sup> 可知康、梁雖對狄氏不滿，而並未使之表面化。以麥孟華入替羅普的想法似亦未付諸實行。康、梁與狄氏分手，在辛亥革命以後，狄退還了康、梁的股本，（包天笑說是康梁撤走的），時報也就成了狄氏的獨資事業，但旋即步入衰落的階段。

## (八)

一張有影響力的報紙，不一定是一份賺錢的報紙。紐約時報是美國知識界的寵

④ 關於政聞社，見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頁一八四～一九三；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三二四～三二七，三四八～三六一。

⑤ 梁啓超邀請張謇參加政聞社，張不置可否，及至徐佛蘇在上海宴客，演說政聞社宗旨，希望得到士紳支持，張氏未到場。（見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一二一）。

⑥ 丁編，梁譜，頁二六〇～二六一。

⑦ 包天笑，「辛亥革命前後的上海新聞界」，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八九。

兒，但其銷路則遠不如大衆化的每日新聞 (Daily News)，上海時報的風格近乎紐約時報，它對於當時的教育家、文學家，著有信仰，受學校之歡迎，青年學子尤其視為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他們不僅喜愛時報的編排方式，言論方向，同時也愛好它的第一版廣告，知識分子幾乎養成了翻閱時報的習慣。但是時報的銷路並不很大，其不能與申、新兩報競爭，正有如紐約時報之不能與每日新聞競爭。清末上海的報紙雖然行銷全國，究竟讀報的人數不多。戈公振說民國十五年時，全國平均每一百六十四人才買一份報紙，<sup>⑬</sup>二十年前的平均數，或許不及其半。時報的銷路甚為有限。根據包天笑的說法，申報與時報比較，前者在本埠的銷售量大於後者，可知時報在上海並非普及讀物。上海是一個商業都市，商人們希望一份報紙上各類廣告，應有盡有。但時報却不符合他們的胃口，難怪時報在本埠的銷售不能與申、新兩報競爭。時報依靠外埠的銷數來彌補。該報在北京、蘇州、杭州有分館，但究竟隔日報紙減少了它的吸引力，外埠亦不能刺激大量的銷售。時報的確實銷售數字不可知，而每年虧損二萬元則為事實。<sup>⑭</sup>

時報的財務不能平衡，年有赤字，銷路未能打開是其結果，而經營不善則為原因。狄葆賢的思想固然相當新穎，然自幼養尊處優，一直過的是「公子哥兒的生活」，又是一個文人，「在從前以一個文人辦點商業性質的事，終究是失敗的佔多數。」<sup>⑮</sup>不僅如此，狄氏還是一個篤信的佛教徒，人生觀消極，忽略了商業上的開拓與進取。時報走上失敗的道路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時報經營不善，「鉛字拆了版不歸還原位，排字房竟搜出半房間的鉛字。」<sup>⑯</sup>由此一例可以知道管理之不上軌道。

時報年有虧損，大多依靠康有為匯款接濟。康氏於一九〇五年及一九〇六年分別各匯一萬餘元，一九〇七匯一萬元，代交三年利息三萬餘元，都是彌補赤字。因為有康有為的支持，時報在辛亥革命以前，表面上看去是欣欣向榮的，其貧血病並沒有顯露出來。

到了民國元年，時報才真正步入了困境。第一，共和建立之後，人們認為它帶

⑬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三〇四。

⑭ 丁編，梁譜，頁二六一。

⑮ 包天笑，釤影樓回憶錄，頁三二八。

⑯ 同上。

有保皇黨的臭味，已經不合時宜，那知道康梁的股份已經退出了呢？而時報本來仰賴康梁的接濟來彌補赤字，而今來源無着，困難倍增。

時報衰落的最大原因，為申報挖角，挖走了陳冷。陳氏的文筆及辦事能力冠全館，狄氏言聽計從，開館以來，倚為左右臂。該報最受人歡迎的時評欄，為陳氏所創，報紙版面的新穎作風亦多其獻議，人以時報臺柱視之，當之無愧。但民國元年史量才自席子佩手中買過申報，（張謇、趙鳳昌所促成，二人亦申報大股東）大展鴻圖，看準了陳冷的才幹，以高薪羅致。（申報薪水三百元一月，時報僅其半）陳氏被挖的過程中，狄葆賢被瞞着一無所知，及至宣布，已是無可奈何。狄不僅受張謇、趙鳳昌的壓力，沈恩孚、黃炎培等亦為史量才幫腔說話，狄孤掌難鳴。陳冷雖然仍任時報顧問，不時到館協助處理館務，究竟不再是時報的人。報館情況本來不好，少了陳冷，自此每下愈況。

陳冷離館予狄葆賢心理打擊甚大，一個佛教徒原本消極，此後益發頹廢。包天笑說民國元年為時報的分水嶺。元年以後，狄氏的興趣似乎完全寄托在「有正書局」<sup>②</sup>方面。他用珂羅版套印古畫，聊以自遣，不再多問時報的業務。本來每天到館處理館務，拆看信件，陳冷走後，深居簡出，每天打個電話問問，信件也不看了。息樓當然不再像從前熱鬧，<sup>③</sup>舊日的常客有的做官去了，有的不再過訪，工作人員也有若干更動，<sup>④</sup>令人不勝今昔之感。<sup>⑤</sup>當然申報有發展，便是時報的損害。以前是申報、新聞報暮氣，時報獨樹一幟，現在申報亦革新，求發展，有張謇等支持，實大聲宏，有了時報的長處，時報當然不敵。

## （九）

任何商業性質的事業，有興必有衰，時報在民國以後的衰落，種種因素，可以

<sup>②</sup> 狄葆賢創時報不久，又創「有正書局」，其珂羅版名畫集頗有盈餘，有正書局的業務亦較時報上軌道，民國以後，時報的虧損，多由「有正」彌補。（同上，頁四一四~四一五。）

<sup>③</sup> 包天笑說息樓後來變成了打牌和吃吃喝喝的地方，已沒有早先的萬千氣象。（見同上，頁四一三。）

<sup>④</sup> 以本埠新聞編輯為例，最初是雷奮，一九一〇年雷氏當選資政院議員去了北京，本埠版由林康侯繼；林去，由沈叔達繼；沈去，由龔子英繼；龔去，瞿紹伊繼、戈公振繼。

<sup>⑤</sup> 時報於民國十年十月以四萬元賣予黃承恩（字伯惠，原籍安徽休寧，寄籍江蘇洙涇，留學英國），以社會新聞爭取讀者，亦不見起色，民國二十九年停刊。有謂停刊係受敵偽壓迫者。（邵翼之，「我所知道的上海時報」，報學，卷一，期八，〔民四四年十二月〕）。

不必深論，惟時報在清季為維新派的喉舌，則不能不予以注意。狄葆賢主持下的時報，雖然未能完全符合康、梁的要求，但是它的言論方向，從進取的角度觀之，其影響清季政治，遠過於康梁的要求。時報對於中國新聞事業的貢獻尤其重大，中國新聞紙走向一個新的方向，時報的誕生是一個大關鍵，它帶來了報界新的朝氣，此朝氣影響各報隨之改革。時報創刊之次年（一九〇五）上海報界的蓬勃氣象，大有脫胎換骨之感。是年時報很驕傲地刊出「日報界之大活動」一文說：

「我國之有日報，不自今日始矣，然而自今日以前，我中國之所謂日報，不能如今日之整頓者，何也？去年之日報，無異前年；前年之日報，無異前前年。然今日則不然。試觀今日滬上所出各報，其有一與去年相同者乎？中外日報則改樣式矣！所謂整頓矣！新聞報則改樣式矣！所謂整頓矣：即如三十年來一成不變之申報，亦復改樣式矣！所謂整頓矣！雖其改式樣，所謂整頓者，其固視前有勝與否，則天下之人，自有明眼，我亦不願以一人之見，漫為評論。然而無論其勝否何若，其躍然思動之機，實天下所共見。」<sup>⑯</sup>

這話固然自譽得很，但時報打開報界的新機，全是鐵一般的事實。回想狄葆賢的「吾之辦報，非為革新輿論，乃欲革代表輿論之報界耳，」他確確實實的實現了這一個目標。<sup>⑰</sup>

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廿七日

⑯ 時報，乙巳、一、五。轉見胡道靜，「上海的日報」，上海通志館期刊，卷二，期一（民二三年，六月）

⑰ 日本京都大學藏有時報一份，此為海外所僅見之流傳，惟不甚完全，茲將所藏開列如下：

宣統元年十一月——民國九年十二月

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九年十二月

民國二十年三月——廿四年二月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廿六年六月

以上各年時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Microfilm）全份。